史料文献

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科举

张小钢

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和科举的关系，是金圣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因为它关系到对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深层理解，以及对金圣叹文学批评地位的客观评价的问题。

在金圣叹文学批评与科举的关系里，实质上与八股文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。在清代，把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八股文联系起来的议论还没有见到。至多是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里指出圣叹无视《西厢记》的戏曲特点时，曾揶揄道："圣叹所评，乃文人把玩之《西厢》，非优人搬弄之《西厢》也。文字之三味，圣叹已得之；优人搬弄之三味，圣叹犹有待下来。"①

明确把八股文与圣叹的文学批评联系起来，并且对圣叹的文学批评进行否定的还是在废除八股文、废除科举以后。民国九年，胡适在《水浒传考证》里写道："金圣叹用了当时'选家'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，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，成了一部'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'！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'哨棒'，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'帘子'，和三十八次'笑'。圣叹说这是'草蛇灰线法'！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，读了不但没有益处，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，是很有害的。"②

胡适作为提倡白话文、倡导新文学运动的先驱，否定已经失去生命力、阻碍社会发展的八股文是很自然的事。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，否定金圣叹的文学批评，总是与否定科举、否定八股文的议论联系起来，应该说与胡适的这段评论不无关系。

最近几年，金圣叹时来运转，研究圣叹文学批评之潮流，已从否定转向肯定。笔者无心随潮，但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见解。对圣叹的文学批评与科举、与八股文的关系作一个梳理，以便更加客观地评价圣叹的文学批评。

一、金圣叹对待科举的态度

金圣叹对科举一向是采取了不敬的态度。我们先看一下他对科举考试的基本教科书"四书五经"的学习态度：

（1）吾年十岁，方入乡塾，随例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，意昏如也。每与同塾儿作是语："不知习此将为何者？"③

（2）记圣叹读《论语》至"子张问：'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'见下文忽接云：'子曰：何哉，所以达者？"不觉失惊吐舌，蒙师怪之。④

（3）梁惠王曰："寡人愿安承教。"孟子对曰："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"曰："无以异也。""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"曰："无以异也。"此等文，只为幼时怕先生扑，不免读得烂熟。⑤

以上表明，圣叹对《四书》等持怀疑态

[收稿日期] 2000－9－10

[作者简介] 张小钢（1957—），男，日本关西大学讲师

度，只是怕挨打，才勉强背诵。这与对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等文学作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圣叹十一岁的时候，经常生病，回家养病期间，他阅读了《妙法连花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。他读《会真记》，“几欲拔刀而起”；读《西厢记》，“悄然废书而卧者三、四日”，“曾焚香拜伏于地，不敢起立焉”（《西厢记》一之三、一之四）。可以说是心灵受到巨大撞击，犹如五雷轰顶，只有顶礼膜拜而已。圣叹最喜欢读的还是《水浒传》，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开始评点《水浒传》，“吾日夜手抄，谬自评释”（《水浒传》序三）。全副的心灵，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其中。

再看他对科举考试的态度：“少补博士弟子员，以岁试怪诞黜革；及科试，顶金人瑞名就试，即拔第一，补吴庠生。”[6]圣叹究竟缘何得罪，署名采衡子的作者在《虫鸣漫录》里有较为具体的记述：“每遇岁试，或以俚词入诗文，或于卷尾作小说讥刺试官，则被黜。”[7]这则材料的可信度虽然还有待证实，但还是反映了圣叹的真实心态。这从他的禅宗著作《西城风俗记》也可以得到旁证：

衍兄问：“今年召进士若是圣叹，有何披宣?”圣叹云：“只道得个伏惟皇上。”[8]

圣叹的回答貌似禅语，但同此心态的人看了都会报以会心的一笑，“悟”出其中的奥秘。总之，这个玩笑和讥刺考官的恶作剧相比，也开得太大了一点，大有“犯上”的嫌疑，而且是“证据确凿”。但圣叹为什么一面想方设法冒名参加科举；一面却是批判科举、嘲弄考官？——“古人重科名而轻爵位。重科名所以验其学，轻爵位所以励其守。”[9]此亦明清一部分文人心态的写照。

甲申（1644）之变后，圣叹对科举考试连嘲弄、恶作剧的兴趣也没有了，他和众多的江南的文人们一样，“绝意进仕”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少年时代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，还是给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，对他日后的文学批评起到重要作用。

二、六才子书与六经

圣叹虽说是对科举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，但他毕竟是生活在科举社会里，科举像他的影子一样，形影相随。这一点，在他构筑自己的“六才子书”的世界里，也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有关“六才子书”的说法早已有之。就圣叹而言，据说是受了李卓吾的影响。李卓吾曾提出：“宇宙内，有五部大文章：汉有司马子长《史记》，唐有杜子美集，宋有苏子瞻集，元有施耐庵《水浒传》，明有李献吾集。”[10]陈登原先生认为此即后日圣叹才子书所本。

圣叹的才子书有六：即《离骚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杜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。陈登原先生认为这是按照文学体裁而择，他在《金圣叹传》里写道：“若《史记》，则史之代表；若杜诗《离骚》，则诗歌之代表；若《庄子》，则子之代表；若《水浒》，则小说之代表；若西厢，则戏剧之代表；兼收并蓄，不遗钜细。”[11]

陈登原先生的分析虽不失为一家之言，但亦有勉强之处。如诗歌为何代表有二？若此则《左传》、唐诗、南华诸书又作何解释？圣叹早年批评《水浒传》时，常将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并提，晚年批评《西厢记》时，又将《左传》置于《史记》诸书之上：

> 《左传》之文，庄生又其以骀宕，《孟子》七篇有奇峭，《国策》有其匝缀，太史公有其巉岩。夫庄生、《孟子》、《国策》、太史公又何足多道![12]

因此，很难说是完全按文学体裁而择的。倒不如说他拘泥在“六”这个数字上。具体地说就是他要构筑一个与六经相对应的世界。所谓六经，就是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》。关于六经的说法，最早见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，其中《乐》早已失传，据推测是秦始皇焚书所毁。亦又有人主张《乐》包括在《诗》、《礼记》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六经实际上与五经是一回事。

圣叹在《水浒传》序一里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。[13]他首先对“才子”下了一个定义。

首先，圣叹提出了“圣人之作书也以德，古人作书也以才。”明确地建立了以德作书的“圣人”和以才作书的“古人”这两个对应的概念。但他所说的才子实际上是包括今人在内的（他自己就自负为才子）。

其次，他认为才子“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”。既没有门阀世袭，也没有别人能企及之虞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“庄周有庄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马迁有马迁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”

第三，他认为才子都有天生的素质，这就是所谓“才之为材”之说。“才之为材也。凌云蔽日之姿，其初本于破核分荚；于破核分荚之时，具有凌云蔽日之势；于凌云蔽日之时，不出破核分荚之势，此所谓材之说也。”

第四，他主张具有写好文章的能力，应是才子的必备条件之一。这就是“才之为言裁”之说。“又才之为言裁也。又全锦在手，无全锦在目；无全衣在目，又全衣在心；见其领，知其袖；见其襟，知其披帔也。夫领则非袖，而襟则非帔，然左右相就，前后相合，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谓裁之说也。”

第五，圣叹认为才子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殚思竭虑的艰难过程，即“文成于难”之说。“依文成于难之说，则必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，然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得成一书者也。”

由此可知，圣叹的才子是与圣人相对应的概念，才子不是用“德”去衡量，而是用文章去衡量的。围绕着文章，从作者的才能到创作过程，规定了“才子”的条件。

那么才子的书又有什么特点呢？圣叹举出了六才子书之一的《庄子》，他用“精严”二字概括了《庄子》的特点。并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“精严”。“何谓之精严？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是也。”

在《水浒传序二》里，圣叹又对其子金雍这样介绍《水浒传》道：“夫固以为《水浒》之文精严，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书法也。”

一句话，六才子书作为文章的最高典范，字法、句法、章法精严是其最大特点。

从圣叹所举的才子以及才子书的上述要点来看，非常明确地显示出他的有关才子以及才子书的主张，都是在与六经相对应意识过程中形成的。这种对应意识在圣叹的具体议论中也时有所见。比如说有关《离骚》的议论，这主要见于圣叹的《易》的研究的著述《随手通》中。《随手通》里有一篇《序离骚经》，单看这题目，将《离骚》称作“经”，就可以想见圣叹别有一番用意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圣叹第一次尝试用《易》的方法论来系统批评《离骚》。他开宗明义，认为《易》是《离骚》的底本：“夫《易》主十四彖，此真《离骚》之底本也。”[14]

圣叹主张《易》是《离骚》底本的最大理由，就是《离骚》也是“忧患之书”。他写道：“《周易》全是圣人一种忧患之心迫而成书，后惟屈子《离骚》深得其旨……夫‘骚’者，忧也……‘离’者，罹也。屈子自伤，不幸毕其生罹于忧中，不能自拔出也。”[15]

圣叹的这一解释实是借助了司马迁的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之说法，来证明才子书足与六经“分庭抗礼”。这里需指出的是，清人廖燕《圣叹传》和无名氏的《辛丑纪闻》里，都把《离骚》作为第一才子书，但陈登原根据《金昌叙圣叹杜诗解》里“庄屈龙门而下”一句话，把《离骚》认定为第二才子书。但是，《易》作为中国人思维方法的源流，在六经里也是排第一的情况来看，《离骚》排第一才子书的坐次，恐怕还不能简单改变。圣叹把六才子书与六经相对应，也提高了六才子书的地位，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。

另外，就六经整体而言，也是孔子在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，对社会现实完全失望后编次的东西。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，社会动荡，盗贼横行，科举的弊端百出，圣人们的六经里所展现的政治理想，在科举社会的现实里显得苍白无力。而圣叹的《水浒传》批评，又恰恰是在明王朝覆灭前三年的事，他在《水浒传》里言辞激烈地批判了朝廷的失政，盗贼的横行，人民的困苦，以及人不能尽其才的社会现实，可以想见，他在《水浒传》序里，议论圣人与古人（才子）、六经与才子书的问题时的心情，也许他体察到了孔子的心情！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里，六经的精神不传，需要六才子书以兴。所以，他在《水浒传》序一的最后写道：

> 夫身为庶人，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，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，条分而节

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，已作之书一旦尽废，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，为更奇于秦人之火。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。[16]

三、八股文与“文法”

圣叹要确立才子书的地位，获得社会的认同，还要通过大量的批评来证明才子书的文学价值。这里就涉及到所谓八股文式的批评方法。尽管圣叹对科举、对八股文章持批判的态度，但他的知识无疑只能是来自于他所受的科举教育。

明清两代，儿童五、六岁入塾启蒙，多习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。圣叹十岁入塾，似为稍晚。但他的启蒙教育似为父母所授，入塾后即习四书五经，属直接读习举业，尚不算晚。八股文应是必修科目。学完八股文及试帖诗，才算毕业。圣叹聪明好学，“少补博士弟子员，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；及科试，顶金人瑞名就试，即拔第一，补吴庠生。”这说明他对八股文这套已经揣摸得烂熟，只要认真去做就能取得好成绩。

有关八股文的形成时期，诸说不一，但一般认为八股文文体的形成是明代的成化年间。[17]王鏊被尊为“制义开山”，他说：“世谓六经无文法，不知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。”[18]所以，他作八股文也讲究“文法”。明代的正德、嘉靖两朝是八股文的全盛期，唐荆川、归震川、茅鹿门、胡二溪等人是这个时期的八股文大家。到了隆庆、万历两朝，就八股文风格来讲，虽有田万德、邓以赞的“圆机”，汤若士、许钟斗的“熟调”，标志着八股文的成熟；但汤霍林讲究的“机巧纤薄之法”（即所谓“机法”，俗称“隆万机法”），对世风影响颇大，显示出八股文开始走下坡路。圣叹的出生推定在万历三十六年，十岁入塾，当在万历四十六年，可以说，他的启蒙教育都是在这个八股文走向僵化、走向形式主义的时代进行的。但在圣叹的时代，还不能说是八股文的完结。郭绍虞教授曾指出：

> 我们假使于一切时代取其代表的文学，于汉取赋，于六朝取骈，于唐朝取诗，于宋取词，于元取曲，那么于明无宁取时文……明代的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；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，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。[19]

这种高度评价并不过分。明代的代表文学有小说自不待言，但小说并不是明代才有。而科举制度孕育了几百年的八股文才是明代独有的奇观。科举制度为破除门阀，荐贤举才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明代的人们热情地研习八股文，书商们也唯利是图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八股文以及参考书。现在我们从这些出版物中，可以看到明人是怎样对待和分析八股文文法的，以及圣叹是怎样受到他们文章论的影响的。

第一个方面是史书。明人选评史书的目的主要有二：一是为了纠正应付考试的学习偏颇。明人胡应麟曾这样记述人们买书的情形：“今文人所急者，先秦诸书；诗流所急者，盛唐诸书；举子所急者，宋世诸书。”[20]当时人们读书面窄、急功好利的样子跃如纸面。其中，举子们只买与科举有关的《四书集注》之类的朱子类书籍，令人忧虑。万历己未进士顾锡畴写道：“方今圣明侧席，须通今博古之识，宁惟宋儒是赖。”[21]为了教育举子们有“通今博古之识”，科举的成功者、八股文大家们纷纷开始选评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、《汉书》等史书，就《史记》而言，最早的评点当是正德朝（1506—1521）的状元杨慎（字用修，号升庵）的《史记题评》，以后各朝如嘉靖的唐荆川、茅鹿门、归有光、穆文熙，隆庆的李廷机、邓以赞，万历的孙月峰、汤宾尹、钟伯敬、凌志隆、李光缙，天启的陈仁锡，崇祯的陈子龙等均有评本。二是明人认为史书是文章的最高模本，如陈仁锡认为：“《史记》易文章之法祖，诗文章之铃铎也。”[22]又如冯元仲认为：“韵至屈骚，文至《史记》，而千古之能事绝矣。”[23]都从文章的角度给以最高的赞词，同时他们也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“文法”（包括读法、字法、句法、章法等），作为评文和衡文的准则，给那些学文章的人、特别是那些研习八股文的举子们提供一些指导。

明人的这些对史书的观点和总结的文法，对圣叹有很大影响。

首先，是表现在圣叹对《史记》重视，他把

《史记》列为才子书之一，并对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赞”部分作了点评。其次，他把《水浒传》与《史记》并提，把史书和小说的异同之处分析得淋漓尽致，特别是在分析文法时，他的种种所谓八股文式的分析，也有不少来自史书的评点。比如说，前面胡适所提到的“十八次哨棒”、“十四次帘子”、“三十八次笑”，在史书的评点里比比皆是。例如，茅鹿门在《史记钞》里有“五非字作波澜，甚奇伟。”“连用三不敢字状羽威猛。”[26]讲重叠字法对衬托的重要；钟伯敬在《史记奇钞》里有“滕公与人何具眼，连用三奇字，九亡字以慕之。”[27]讲重叠字法对人的心理描写的重要；离圣叹较近的万历二年的进士孙月峰，在其批评的《史记》里就有“篇中十五天下字，十三足下字，四先生字，十一陈留字，十四沛公字，若故重之以见奇者，其他语亦多重。”[28]讲重叠字法对人物性格描写之重要；这些批评都是作为重要的“字法”来考虑的。决非是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。圣叹继承了前人的这种批评传统，语出惊人，打动人心，形成圣叹批评的特点之一。

其次是表现在圣叹对《左传》的重视。明崇祯十四年(1641)的《水浒传》批评里，圣叹常常将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并提。清顺治十三年(1656)，圣叹四十八岁，他在《西厢记》的批评里，对《左传》格外钟情，将《左传》置于《史记》之上，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。《左传》的评点较《史记》简单，且议论范围也没有《史记》广。不过，重视字法、句法、章法这一基本批评态度和《史记》评点是一样的。

综观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的评点，所总结的“文法”，如提纲挈领法、主客(主宾)法、虚实法、激射法、开合法、错综法、张本(首尾呼应、首尾相应)法、起承转合(起承转结)法等等，在八股文的实践和批评中大都可以见到，圣叹乃受前人影响且继承加以提升而已。

第二个方面是古文。古文的选评最早始于宋代，主要是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、吕祖谦的《古文关键》、谢枋得的《文章轨范》和楼昉的《崇古文诀》。这些选本即使到了明代，出版商们也屡出不厌。当然明代的评家、选家们也深受其影响。如虞绍庵的《文选心诀》、茅鹿门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、归震川的《文章指南》、张侗初的《必读古文》均是很有影响的选本。特别是以唐荆川、茅鹿门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文章家们下力最大，且身体力行。如《明文钞四编》指出：“以古文为时文。自唐荆川始。而归震川又恢之以宏肆。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，达程朱之理。”[29]

这里的“古文”主要指的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。“以古文为时文”就是在写作八股文时实践唐宋派的主张，是想纠正主张“文必秦汉”的复古派的一些偏颇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明代，各流派的代表人物都热心地参加了评点工作。而且，他们的文章论在很多地方都有共同之处，圣叹也不例外。他在《西厢记》里写道：

> 作者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作的好文字，曾将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庄》、《骚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韩、柳、三苏等书，杂撰一百余篇，余依张侗初先生《必读古文书》旧名，只加“才子”二字，名曰《才子必读书》，盖志望读者之必为才子也。[30]

在这里，他非常明确地说明，评点选编古文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教育子弟，作好文章。所谓好文章无非是私塾里练习写作的八比之类的东西。顺便提一句的是圣叹并不赞同唐宋派的看法，而推崇先秦的文章。

第三个方面是四子书以及八股文选本。四子书方面如杨起元的(一说系李贽所著)《四书眼》、钟惺的《四书参》、王梦简的《四书徵》、佘应科《四书千百年眼》、葛寅亮的《四书醒人语》、李九我的《四书文林贯旨》等，不可胜数。明代的八股文选本据说也不少。早在正德朝的杨慎著有《经义模范》，说明明人早已注意收集整理八股文的精华。

就圣叹而言，他与四子书评点的关联性较小。但与八股文评点不能完全说没有关系。因为圣叹的八股文式的批评方法有些直接来自八股文评点也未可知。比如说，胡适提到的那有名的“草蛇灰线法”，在明人张溥对八股文的“中比式”有如下说明：

> 中比当知起承转合之法。几句起，几句承，几句转，几句合，此章法也，毫不可紊。旧多立柱，今则不然。然不旧不俗，柱亦何伤。但遣词各亦联络照应，须如灰中线，路里草蛇踪，默默相应可也。[31]

由此可知，“草蛇灰线法”也是在圣叹以前

就有了的。清代坊间所梓的八股文集《明文钞初编·小题文》中，有其一则评点：

> 题文成林，悉以存商丘论。吾不知此何兴会耶。有题眼应觑前，有题眼应觑后。若率胸臆自作评论，又何事借径遣经乎。此文廓清从来恶习。真乃比于武事也。[30]

最近，笔者发现了金圣叹评点八股文的一个选本《金圣叹先生评选小题才子文》[31]，证实圣叹确曾评点过八股文。

从以上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八股文的"文法"之类的东西，并不完全是八股文的专利，不少观点是明人在研习八股文的过程中，从评点史书、古文等文章中总结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文章法则。与八股文相比，莫如说是圣叹直接从史书、古文中吸取了这些文章评点的精华。所谓"八股文式"的文学批评，不独于圣叹，实则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。此外，就八股文而言，明人以古文入八股文(唐荆川)，以禅入八股文(艾南英)，所有这些努力，都给八股文带来了生气，丰富和发展了八股文。我们对八股文还不十分了解，八股文的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。因此，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八股文，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圣叹的"八股文式"的文学批评。

四、一副手眼的批评家

崇祯十四年(1641)，圣叹批评《水浒传》，顺治十三年(1656)，批评《西厢记》，这中间十几年圣叹没有批点六才子书，而是热衷于禅宗。比较一下《水浒传》和《西厢记》，我们就会看出圣叹批评风格的明显变化。在《西厢记》的批评中，早年的愤世嫉俗的议论少了，以禅理议论的多了。以禅理评诗，在诗话中早已有之，然以禅理评小说，评戏曲，实数圣叹首创。此外对作品也显示出一种宽容的态度，不是采取"腰斩"，而是保留了认为不佳结尾之四章。然而，有一个始终未变的特点，那就是他的八股文式的批评方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"一副手眼"。

> 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，《西厢记》乃是其一。然其实六部书，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。如读《西厢记》，实是用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手眼读得。使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，亦只用读《西厢记》手眼读得。[32]

圣叹用一副手眼批评的最大特点是无视各种文学的体裁，用"起承转合"(亦称"起承转结")来衡量文章的优劣。他批《水浒传》、批《西厢记》、批唐诗等书都是用了这样的批评方法。

圣叹评《水浒传》，把《水浒传》看成是一篇文字，即"起承转合"："凡人读一部书，须要把眼光放得长。如《水浒传》七十回，只用一目便下，便知其两千余纸，只是一篇文字。中间许多事体，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。若是拖长看去都不见。"[33]

在具体分析方面，圣叹把着眼点放在"石碣"的描写上。即《楔子》里"洪太尉误走妖魔"一段，洪太尉强令打开石碣，由此导出一百零八个好汉的出场，标志着《水浒传》的开篇。七十回"忠义堂石碣受天文"，写宋江打东平、东昌两府大胜，还山后举行祭天法事，一百零八个好汉排坐次。这时，从空中落下一块巨石，众人们上去一看，原来上面刻着一百零八人的姓名。圣叹认为，小说到此就算结束。"或问：石碣天文，为是真又是事？为是宋江伪造？此痴人说梦之智也，作者又图叙事既毕，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，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。"[34]

因此，他毫不客气地把后四十九回砍掉了。诚然，圣叹在政治观点上，并不同意李卓吾的"忠义"的说法，他明确主张盗贼应该严惩，招安只能助长盗贼横行，导致政治混乱。这也许是他"腰斩"《水浒传》的原因之一。但是，这并不能否认他出于文章学的理由对《水浒传》的删改。本文在前面也曾谈到，圣叹在《水浒传序一》里详细论述了他对构筑"六才子书"世界的基本想法，那就是文章的美的世界。从文章论的角度批评六才子书，这是圣叹的基本姿态。

腰斩《水浒》，这几百年来一直是圣叹的一个大罪。不过，金批七十回本问世后，反响巨大，受到读者欢迎，甚至于其他的《水浒传》版本近于绝迹。以至到了胡适研究《水浒传》的祖本时，不得不通过日本的学者寻找其他版本。这从客观上说明，经过圣叹删改后，七十回本文字精炼、结构紧凑、人物性格更富有个性，成为更适合阅读的本子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七十回本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能够广

泛流传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，而是圣叹作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，真正批了一部优秀作品之所以优秀的结果。

时隔十几年后，圣叹评《西厢记》，依然保持着这一批评态度："譬如文字，则双文是题目，张生是文字，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。有此许多起承转合，便令题目透出文字，文字透入题目也；其余如夫人等，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。"[35]

从这段议论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圣叹运用"起承转合"的文章法则非常灵活自在，他运用"起承转合"这把钥匙，分析出人物关系（具体说就是双文与张生的爱情纠葛，与红娘在中间所起的作用）决定故事曲折发展的特点。这也是《西厢记》这部作品的文章特点。从"起承转合"的角度出发，圣叹认为作品的结尾四章属于续貂。不过，这次，他没有像批《水浒》那样"腰斩"，而是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判断，表现出一个批评家的成熟。

另外，诚如清人李渔所指出的，圣叹无视《西厢记》的戏曲特点。这不是他没有注意到文体的问题，而是有意为之。圣叹评唐诗也还是不考虑文学体裁的特点：

> (1)诗与语言虽是两样体，却一样法者，起承转合也。除起承转合，更无文法，除起承转合，更无诗法也。学作文，必从破题起。学作诗，亦必从第一二句起，方谓之诗。为其有起承转合也。不见人作文，却先作中二比也。[36]
>
> (2)唐人诗，多以四句为一解。故虽律诗，亦必作二解。若长篇，则或至作数十解。夫人未有解不识而尚为诗者也。如此篇第一解，曲尽东都丑态；第二解，故作解释；第三解，诀劝其行。分作三解，文字便有起有转，有承有结。[37]
>
> (3)大体圣贤立言有体，起有起法，承有承法，转合有转合之法。大篇如是，小篇亦复如是。非如后世涂抹小生，视为偶然而已。吾不信天下事，有此偶然又偶然也……后来董解元《西厢记》善用此法。[38]

圣叹既然已经有了"腰斩《水浒》"、"阉割《西厢》"的前科，这次也难逃"腰斩唐诗"的罪名。他不但遇到了敌对者的批判，而且遇到了一些朋友们的非难。我们可以从其子金雍所编的《渔庭贯闻》中窥见若干。尽管如此，圣叹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：

> 诗本以六句为律，圣叹何得强为之分解？须知圣叹不是好肉生疮，正是对病发药。唐制八句，原止二句起，二句承，二句转，二句合，为一定之律。[39]

当然圣叹也有不少支持者，其中，徐增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："圣叹唐才子书，其论律分前解、后解，截然不可假借。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，眼光明澈，便出一手，吾最服其胆识。"[40]

清人张潮在《而庵诗话小引》里，这样叙述了自己的感想："徐子而庵所说唐诗，凡三百五篇。其与同学论诗，即宋、元人诗话是也。余尝取而读之，大抵与金子圣叹所评唐才子诗相为表里，以分解为主，以起承转合为法。"

总之，圣叹批《水浒传》，批《西厢记》，批唐诗，都引来了不少非议。究其原因，无不与他的一副手眼的批评方法有关。是非得失，见仁见智。然而，圣叹靠这副手眼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文学批评体系是无可置疑的。

五、结束语

"起承转合"之类的方法并非八股文专利，而是文章的普遍准则，在八股文之前早已有之，只不过在八股文这种特殊文体中，表现得更充分而已。这些法则，不仅形成了八股文体的严谨简洁等特点，在古典文论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。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八股文，否定圣叹的文学批评。

圣叹的文学批评主要从史书、古文等评点中吸取了大量的养料，不过，这些评点主要还是为科举服务的，评点者们大都是科举的成功者、八股文的名家，他们的评点不能不意识到八股文的存在，他们规范出的文章法则更是出于对八股文的考虑。因此，圣叹的文学批评让人感到八股习气也是很自然的事。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圣叹的这一文学批评的特点与八股文挂钩，而是应该在科举这个大环境里加以考察。

圣叹一向以才子自居，天马行空、狂放不羁。即使是对当今皇上，他也敢开玩笑。唯有一次，他感恩戴德，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：

> 顺治庚子正月，邵子兰雪从都门归，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，谕词臣“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时文眼光看他”等语，家兄长文具为某道。某感而泪下，因北向叩首做赋。[41]

圣叹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知己，感激涕零之余，面朝皇上住的北京叩首赋诗。“借问随班何处立？香炉北上是经筵。”“点朱点墨官供笔，论月论年敕闭门。”表达出愿为皇上效力的迫切心情。前面已经介绍了他对科举的态度，进而对皇上不敬的态度。不管在明代，还是在清代，他都没有想通过科举，通过写八股文来博取名利，即使是在他饿得揭不开锅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但他希望自己的才子书，自己对文章的见识能得到世间的评价。因此，当他听说皇上赞赏他是“古文高手”，告诫词臣们不要以八股文的眼光看他的时候，他那份才子的矜持，那点反清的情绪，也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圣叹希望以文章评价自己，而不是八股文。若是他知道几百年后的胡适以八股文否定自己的话，他会感到怎样的委屈？

---

① 李渔《闲情偶记》卷二，第59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2月版。

② 胡适《胡适文存》第一集卷三，第501页，台湾远东图书公司，1990年4月版。

③ 贯华堂本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卷一，《水浒传序三》，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，以下略称《水浒传》。

④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87页，《西厢记》卷之五。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9月版。

⑤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697页，《释孟子四章》第四章。

⑥无名氏《哭庙纪略》，《痛史》第二种，商务印书馆，辛亥年十月版。

⑦采衡子《虫鸣漫录》，转引自陈登原《金圣叹传》，香港太平书局，1963年4月版。

⑧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706页。

⑨《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仪·桐川俞长城论次》，文盛堂·怀德堂同梓，乾隆戊午年重镌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⑩周晖《金陵琐事》卷一，转引自陈登原《金圣叹传》。

⑪陈登原《金圣叹传》，第53页。

⑫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50页。

⑬《水浒传》卷一。

⑭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819页，《随手通·序离骚经》。

⑮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822页，《随手通·序略》。

⑯《水浒传》卷一。

⑰关于八股文的形成，清人顾炎武认为：“经义之文，流俗谓之八股，盖始于成化以后。股者，对偶之名也。”《日知录》卷十六。又清人程瑶田有具体说明：“而成化丁未会试‘乐天者保天下’文，上下截各四股，又为八股，格所自始。”《制科小录》。

⑱王鏊《震泽长语》卷下，《百部丛书集成》本。

⑲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第421—422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版。

⑳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，光绪22年，广雅书局校刊。

㉑《史记汇评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㉒《陈太史评阅史记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㉓孙钦《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㉔茅鹿门《史记钞》，卷三秦始皇，卷四项羽。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㉕钟伯敬《史记奇钞》，卷十一淮阴侯列传三十三，日本内阁文库藏本。

㉖孙钦《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》卷十六。

㉗《明文钞四编》，评归有光《吾有十五》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。

㉘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32页，《西厢记》第四卷。

㉙张溥《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》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。

㉚《明文钞初编·小题文》，评叶绍袁《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》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。

㉛该书为笔者在东京大学所见，为光绪己丑年春三月上海扫叶山房重刊本。因本文校样已出，无及详说，只能在此特别说明。

㉜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10页，卷二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。

㉝《第五才子书水浒传·读第五才子书法》。

㉞《第五才子书水浒传》卷七十五。

㉟《金圣叹全集》三，第17页，卷二《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》。

㊱《金圣叹全集》四，第46页，《渔庭贯闻》。

㊲《金圣叹全集》四，第528页，评杜甫《赠李白》。

㊳《金圣叹全集》四，第656页，评杜甫《秋兴八首》。

㊴《金圣叹全集》四，第670页。

㊵《清诗话》上，第432—433页，《而庵诗话》第四十九条。

㊶《金圣叹全集》四，第858页，《沉吟楼诗选》春感八首。